美国动态（半月刊）

2022年6月16日（第262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评布林肯对华政策讲话

美国对华战略基本上与中国的对美战略相同，都是通过投资、协同等方式发挥其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对称性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促进人类进步。如果美国愿意承认这一点，战略竞争就能得到和平管理，实现互惠互利和全球受益的战略合作。

中美关系

美专家：经济与技术并非中美竞争核心

近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网站登载美国国防问题专家亚瑟·泰利斯（Arthur Tellis）的文章称，中美竞争的核心是地缘政治驱动的军事竞争，而非经济和技术。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竞争源于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和需求。中国致力于统一台湾、捍卫冲突边界的领土主张、反对美国的印太安全规划，这些目标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相冲突，激起了地区权力争斗，也成为两国竞争的决定性条件。相比之下，围绕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竞争并非利害关系的核心，不足以解释中美竞争。

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存在一些关键性的利益之争：包括政权连续性、第三方联盟以及印太军事力量平衡等。这些因素能影响中美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尽管经济和技术能协助国家塑造和控制竞争以及形成自身优势，但无法有效推进领土、边界、安全架构和国防相关的政治目标。

纵使经济和技术的效用有限，但其对军事力量平衡的影响值得重视。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越大、越发达的国家更容易获取、采购和制造军事装备，因而具备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中美军事竞争中，国家整体军事实力远不如在印太地区实现具体的军事平衡那般重要。经济和技术不太可能为军事提供决定性或持久的优势。经济是一个灵活变量，在短期内可能有约束力，但长期来看是多变的，军事生产更多是受到政策选择的限制。技术的作用同样有限，因为军事技术范围相对狭隘，军事采购程序和作战概念僵化等其他因素也会限制技术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程度。对

此，美国应该警惕那些基于经济和技术竞争需求的政策，将中美竞争限定为核心地缘政治利益驱动的军事竞争更符合美国利益。

美学者评布林肯对华政策讲话

美国对华战略基本上与中国的对美战略相同，都是通过投资、协同等方式发挥其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对称性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促进人类进步。如果美国愿意承认这一点，战略竞争就能得到和平管理，实现互惠互利和全球受益的战略合作。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杰出研究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详细分析了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且表示美国的对华策略应意识到两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讲话中称中国是“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一挑战的“规模和范围”“将对美国外交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但中国挑战的规模、范围和性质并不完全如布林肯所言，挑战不等同于威胁。布林肯的讲话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布林肯称中国“有意重塑国际秩序”，但“重塑”并不等于“取代”或“摧毁”。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偏好不同，但都希望修改现行秩序。中国领导人主张进行“全球治理改革”，使之更能代表当今世界的力量和利益平衡，重视小国和东亚国家的优先事项；而华盛顿希望推动国际秩序的现代化变革，使其更具代表性。关键问题在于要基于谁的规则进行改革。

其次，布林肯表示中国计划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成为世界领先大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一向将国家目标定义为全球领先强国之一，而非唯一，倡导多极世界。中国明白单极式的全球霸权不可持续且代价高昂，因此中国并不致力于将本国模式强加于他国，取代美国，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如果无法正确认识以上前提，中美将面临“领导权安全困境”，美国对华的“投资、协同、竞争”战略就有受到误导的风险。

最后，布林肯的演讲暗示了美中合作的潜在领域。演讲中概述的大部分美国愿景，都是中方认同的。双方都希望“和平、繁荣和稳定”，两国在全球经济、健康、气候、恐怖主义和危机管理等问题上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美国对华战略基本上与中国的对美战略相同，都是通过投资、协同等方式发挥其对地区战略环境的影响力，正是这种对称性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处，共同分享，促进人类进步。如果美国愿意承认这一点，战略竞争就能得到和平管理，实现互惠互利和全球受益的战略合作。

兰德报告：美国商界对美国政府涉华经贸政策的看法

近日，美国兰德公司（RAND）网站登载相关报告，评估了美国商界对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看法，并为拜登政府提出了相关建议。报告摘要如下：

美国商界虽然普遍支持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应对中国的做法，但依然视中国市场为机遇，并对政府采取的单边关税、涉华贸易限制等举措表示担忧，认为这反而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部分行业团体和公司表示，美国应采取例如“胡萝卜加大棒”或“杠杆和谈判”等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与

中国的经贸竞争。

特朗普政府涉华经贸政策对美国不同行业的影响各异。在制造业、科技及金融领域中，制造业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科技行业次之，金融业最小。由于特朗普政府没有将中美金融一体化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主要威胁，且金融公司对中国市场及其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金融行业受损较小，甚至还获得了更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因此，美国金融公司对政府涉华行动的态度较积极。

对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利用经济制裁来鼓励中国改变其行为的问题，商界观点较复杂。一些企业领导人认为即使在短期内会遭受经济损失，也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另有人指出，用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的会引发中国，乃至全球的“技术民族主义”，会对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大型美国公司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发现，报告为拜登政府如何与美国商界合作共促经济利益，合力制衡中国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的经济战略应该在应对中国挑战与通过投资来加强和维持美国经济技术领导地位之间取得平衡。例如，增加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研究的资助，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公司增加研发投入等。

第二，学会利用全面的贸易和经济工具开展对华竞争。例如，巧用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机制，禁止存在“知识产权盗用风险”的中国公司向美国出口产品等。

第三，在实施重大经济政策前征求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意见，采取多边经济措施。

第四，商界领袖掌握着关键的信息和经验，能够为经济变化或行动提供宝贵意见，政府应在作出重大经济决策前征求其意见。协商和提前告知能使企业更好地规划和调整日后的经营战略。

第五，中国学生和工人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应尽量避免针对中国公民的限制措施。

美学者：美国应审慎对待台湾问题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 6 月 8 日登载约翰•昆西•亚当斯协会(The John Quincy Adams Society）研究员马修·加拉赫（Matthew Gallagher）的文章称，中国大陆若对台湾使用武力不会引发地区危机，两岸危机升级的唯一条件即美国采取军事干预。文章摘要如下：

将台湾地区视为阻止中国大陆“修正”世界秩序的唯一屏障夸大了“保卫”台湾的重要性。诚然，采取军事行动收复台湾能立即将中国大陆的投射能力扩展到第一岛链之外。然而，第二和第三条岛链很容易得到维护，能够持续发挥作用。但美国需警惕的是，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在地理上遏制共产主义向海上扩张的岛链，其战略作用正在减弱。因此，美国与其完全依赖区域遏制战略，倒不如在东半球设置一系列海上据点，这能对中国的航线安全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从更广泛的地缘战略角度来看，收复台湾能将中国大陆军队的投射范围扩大 150 英里左右，这能助其解决南海争端，扩大其专属经济区、改善资源安全。在完成上述一系列与确保领土和资源安全相关的活动之后，中国会迅速安定下来，不太可能采取其他试图“修正”世界秩序的行动，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有机会将权力延伸更远并不等于有能力这样做。中国大陆目前优先考虑的是收复台湾以及削弱试图干预的美国部队，因此，其军事装备和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本地防御的目的。第二，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地区军事势力各有优势。在台湾海峡，前

者优于后者，但在印太的其他地区则相反。即使大陆成功收复台湾也不意味着能够顺利将其势力延伸到东北亚地区。第三，美国并不是唯一能制衡中国大陆的地区势力。虽然中国在向邻国保证和平崛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仍面临着质疑。借收复台湾之名进一步扩大势力会使其迄今为止的外交努力化为泡影，届时，将产生一个庞大而坚定的地区遏华联盟。第四，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使其无法在自己的后院寻求任何战争。中国幅员辽阔，但也存在老龄化、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内部问题。确保海上航线和资源安全能助中国应对内部结构性挑战。

美国外交

美国公众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普遍冷淡

近日，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网站登载其公众舆论中心研究助理艾米丽·沙利文（Emily Sullivan）的文章称，尽管政府重申了美沙关系的重要性，但美国民众对沙特的态度普遍冷淡。文章摘要如下：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跌入“几十年来的最低点”。美沙之间不断加深的政治分歧影响了美国民众对沙特阿拉伯的看法。据最新民调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沙两国关系逐渐升温，2014 年美国民众对沙特的好感值达到了 42（范围 0-100），而 2020 年该数值却直降到 37。在所有受访的美国人中，只有 5%的民众将沙特视为盟友，28%的人表示不知如何形容美沙两国关系。

美沙两国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政府形式和战略目标，但沙特长期为美国提供石油，而美国则为其提供关键的安全援助。

即使这种关系因美国对伊朗和以色列的政策以及沙特对也门的干预而变得紧张，但仍是两国交往的优先事项。

虽然拜登政府承诺采取相关举措缓和两国关系，但在通货膨胀、油价飙升、中沙关系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下，拜登政府挽救两国关系的能力有限。并且，美国公众对沙特的态度也表明，美沙要建立稳中向好的关系仍需时日。

大西洋理事会学者：美印应加强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Policy）网站 6 月 6 日登载大西洋理事会南亚中心（The Atlantic Council's South Asia Center）非常驻研究员阿南德·拉格拉曼（Anand Raghuraman）的文章称，美印两国应增强技术互信，在数字领域寻求进一步融合，巩固战略性民主数字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在 21 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两国在数字领域的分歧却越来越大。美印间缺乏技术信任，无法就数字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这不仅阻碍了两国在双边贸易谈判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也限制了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与印度进行接触的能力。

为解决科技“信任赤字”问题，美印应通过“数字握手”（digital handshake）解决政策分歧，并建立相关制度来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在此问题上，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欧盟与美国和印度分别成立了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为在最高政治级别讨论数字问题提供了关键平台。美印可以效仿建立一个新的数字经济部长级对话机制。在此机制下，美印可就数据隐私和治理政策、公民自由、技术和社会福利、电子商务、数字金融以及数字供应链和制造业等问题设立联合工作组。

当然，仅仅建立一个官僚机构是不够的，美印数字合作还需要两国领导人的后续支持。兼具两项条件后，美印之间便可推进更实质性的技术合作。美国和印度都应认识到，若两国在数据隐私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则可能导致监管或技术断裂，阻碍数据的自由流动。

美学者：美国应从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近日，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登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兼职学者乔纳森·施罗德（Jonathan Schroden）的文章称，美国应该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崩溃负责，且应努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犯错。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的最新报告，美国阿富汗战略的失败可归结为九点因素。第一，美国撤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直接导致阿富汗安全部队气势下降。第二，在美国与塔利班达成撤出军队和承包商的协议后，美国明显减少了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进攻策略消极、进攻频率降低等方面。第三，美国从未真正协助阿富汗建立起能够自给自足的安全部队，过度依赖外部支持导致其战斗效率低下。第四，阿富汗前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为排除异己频繁更换安全部队领导人，并将受过美国训练的专业军官边缘化，转而支持那些缺乏军事知识的所谓“效忠者”。第五，由于阿富汗领导层认为拜登不会撤军，因此在撤军真实发生后，阿富汗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新的国家安全计划。第六，塔利班军事行动的有效性。此外，战略缺陷、官僚问题、文化差异也是导致阿富汗战败的重要因素。

尽管报告厘清了美国阿富汗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其分析框架并不完美，将阿富汗战败的主要原因直接归咎于美国撤军似乎过于简单。倘若美国没有退出阿富汗，也不尽然能取得战争胜利。事实上，多年来阿富汗安全部队持续衰落，权力倒向塔利班是必然结果。即使美国进一步加大援助，对阿富汗进行体制上与文化上的改革，局势能否逆转也有待观察。阿富汗安全部队崩溃的背后没有“单一最重要”因素，是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报告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即推动问责制的发展。美国要想真正从阿富汗战争中吸取教训需要明确是谁，基于何种信息、流程、制度文化和偏见，在过程中做出了关键决策。此外，问责以及要求做出实质性改变也是政府责任感的一种重要体现。

威尔逊中心学者：拜登政府应重视 IPEF 的价值定位

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网站 6 月 9 日登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亚洲项目研究员帕拉山·帕拉梅斯瓦兰（Prashanth Parameswaran）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地区合作伙伴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界定其价值。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拜登团队迄今为止基于其认定的国内外环境制定的标志性地区经济框架。然而，IPEF 价值的界定和实现必须厘清三点问题。第一，IPEF 是否契合印太地区国家的需求。回答清楚这一问题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IPEF 的潜在吸引力，也可以强调拜登团队对于 IPEF 的定位是为了满足“印太战略”中提到的地区需求，而非仅为了助力对华竞争。

第二，相较于现有的地区经济安排，IPEF 有何优势。当前，

印太地区已拥有诸如 CPTPP、RCEP、DEPA 等一系列更广泛、包容性更强的贸易协定。根据美国决策者的说法，IPEF 是一个旨在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新框架，并非传统贸易协定。IPEF 的性质或许能为其带来一定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市场准入条款，加上严苛的劳工和环境准入标准，不少地区国家仍处于观望态度。

第三，美国自身对印太地区的贡献。美国的经济承诺面临着诸多困难，无论是私营部门等非政府行为体在推动美国与印太地区经济联系方面的重要性，还是美国经济决策的分散性，亦或是美国与印太地区地理上的遥远距离，这些都使美国难以与地区不同国家建立跨境联系。随着大国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美国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鉴于过去几年美国经济承诺的不确定性，像 IPEF 这般积极的区域经济倡议可以被视为一种贡献，不仅可以体现美国的强大号召力和行业领先水平，还可以利用美国广泛的同盟促进不同领域的融合。

诚然，在 IPEF 的发展过程中，要对其价值做出明确评估还为时过早。但 IPEF 将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和 2024 年总统大选。美国决策者如何对 IPEF 进行价值定位以应对潜在挑战将是该机制未来发展的主线。

许多国家不与美国一道制裁俄罗斯的原因

近日，美国《政客》（Politico）杂志网站登载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SIWPS）高级研究员拉詹·梅农（Rajan Menon）等人的文章，对国家选择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及其盟友认为俄乌冲突呈现的道德和战略风险很简单：乌克兰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俄罗斯是“侵略者”。对他们而

言，问题不仅在于乌克兰的独立，还在于民主世界是否愿意捍卫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却没有表现出西方那般浓烈的“道德热情”。

原因一：基于对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考量。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这些国家倾向于将俄乌冲突视为一场地区冲突，而不是像西方那样，视其为对全球稳定和全球秩序的严重威胁。这些国家将国家利益置于美国孤立和制裁俄罗斯的呼吁之上，认为应侧重于推动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而不是利用战争来孤立俄罗斯，甚至是削弱它。以色列和土耳其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努力维护国家间重要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且试图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充当调解员。印度继续重视与莫斯科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尽管现在它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但俄罗斯仍然是其最大的军事供应国，其产品占印度国防进口的近一半。并且，自冲突爆发以来，印度以折扣价购买的俄罗斯石油量是 2021 年全年的两倍多。

原因二：基于对美西方频繁使用制裁的担忧。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国家中有不少亲身经历过美国的制裁。包括 1998 年核试验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购买俄罗斯 S-400 导弹防御系统后的土耳其。这些国家对美国频繁利用美元主导地位实施制裁的行为感到担忧甚至怨恨。

美国为其行为辩解称，制裁对于那些威胁“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国家而言是必要的。但对于南方世界的大部分国家而言，这种论点是虚伪的。从美国对外干预的历史来看，它不止一次在必要时摒弃了上述规则。例如，1999 年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科索沃进行了单方面军事干预等。

这些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对于北美和欧洲以外

的许多国家来说，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中“选边站”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其成本大大超过收益。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在必要时都会选择摒弃的国际准则，更别指望其他国家会愿意牺牲重要利益来捍卫。因此，美国不该再自欺欺人地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将站在己方阵营，力挺乌克兰。

一个国家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利益，以及其愿意牺牲的上限。如果美国选择认清现实——无论这可能多么令人沮丧——而不是选择生活在虚构的美好世界中，认为其他国家会永远追随美国决策者的领导，美国或许能做得更好。否则，美国就得为失望、沮丧和潜在的失败做好准备。

美国政治/其他

传统基金会专家：拜登新税收倡议无助于解决通胀问题

美国新闻网站《每日信号》（The Daily Signal）6 月 14 日登载传统基金会税收政策高级分析师普雷斯顿·布拉什（Preston Brashers）的文章称，提高税率无助于解决通胀问题，还可能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压力。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承认赤字会导致通胀，而其希望采取的措施却并非控制支出，而是呼吁增加税收。拜登政府的新税收计划不仅无法解决通胀问题，甚至可能将情况变得更糟，原因如下：第一，拜登关于新税收计划仅适用于富人和大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拜登政府的支出预算会将其税率提高三分之一。这将是美国企业近 70 年来面临的最大幅度的税率上调。向美国国内企业征收新税可能会导致民众实际工资的下降，无法解决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

第二，拜登针对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倡议分散了民众对于个税的注意力。2017 年的税收改革是美国第 115 届国会的标志性成果，如果本届国会支持拜登的预算政策并任由《减税和就业法案》中的个别条款到期，那么从 2026 年开始，一个美国典型的中低收入的四口之家每年的联邦所得税将增加 1300 美元左右。

第三，拜登支持拟议的“全球税收协定”会使美国家庭受到更多负面影响。拜登的跨国税收倡议参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旨在解决全球经济中的税收和数字服务问题的“双支柱”方案。“支柱一”允许国家向某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征税，即使这些公司在该国没有实体。“支柱二”要求各国采取不低于 15%的全球企业税率，以此来打击跨国公司的逃税和避税行为，同时避免各国竞相逐底的有害税率竞争。据估计，在该方案下，全球 67 家大公司的利润将被重新分配，其中 31 家是美国公司。美国“自愿”将企业税收收入交给其他国家的做法会在联邦预算中造成缺口，而这需要向美国人民征收更多税费来填补。

美学者：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6 月 14 日登载得克萨斯州政策创新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Innovation）的常驻学者梅林·马修斯（Merrill Matthews）的文章称，特朗普虽然继续控制着共和党，但有迹象表明其影响力正在减弱。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通常而言，当美国总统离任后，他们会自愿退出公众视野一段时间，为继任者留足时间和空间大展拳脚。然而，特朗普并非如此，他继续尽己所能地控制着共和党。但近来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迹象一：特朗普的部分盟友和同事正在挑战“选举被盗”的说法。美国许多保守主义人士不相信“选举被盗”的论述，尽管在某些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确实存在违规行为。此外，特朗普阵营的部分人员近来也公开表达了其对“选举被盗”言论的怀疑，包括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前竞选经理比尔·斯特皮恩（Bill Stepien）以及特朗普的亲信、前美国总统顾问凯莉安娜·康威(Kellyanne Conway)等。

迹象二：共和党的“种子选手”正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近来，有几位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开始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副总统彭斯、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等。这些候选人有时会无视特朗普的建议，选择支持自己喜欢的共和党候选人，并且还会强调自己与特朗普政策上的差异。

迹象三：特朗普支持的几名候选人在初选中失败。此前，获得特朗普的认可几乎是赢得共和党初选的必要条件。然而，几位备受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在初选中失利的事实证明，获得特朗普支持可能仍然是一个重要优势，但已无法保证胜选。

迹象四：参议院共和党人无视特朗普关于更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要求。特朗普一直在努力推动“罢免”麦康奈尔的相关事宜，然而，该计划未得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

美专家：“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听证会恐难实现预期目标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斯（Vox）6 月 8 日登载其高级记者扎克·博尚（Zack Beauchamp）的评论文章称，“国会骚乱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不足以克服政治极化和公众淡漠

对事件的影响，难以实现对特朗普的问责。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国会骚乱事件”并未对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形成较大冲击。从民调数据来看，2021 年 1 月 6 日前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立场相对稳定，未发生巨大波动。且随时间流逝，公众对该事件的认知越来越淡漠，认为特朗普应为袭击事件负责的美国人比例出现显著下降，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皆如此。听证会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部分民主党人及独立人士的看法，但由于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仍相当强大，因此，共和党人将难以被说服。

其次，公开听证会并不能弥合两党分歧，难以形成全国性共识。“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是对美国迫在眉睫的民主危机的又一次高调警告，而美国政治系统却依然面临着结构性无力的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在于汇编证据，证明特朗普及其团队在骚乱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对其实现某种问责。特别委员会或许已拥有诸多极不利于特朗普的证据，但其设定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因为大多数共和党人依然将骚乱视为抗议活动，并认为民主党人盗取了 2020 总统选举的胜利，听证会上的信息不足以克服这种强大的心理力量。

最后，听证会的悲观前景具有政治极化的深刻原因。美国政治被极端党派的逻辑所支配，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对方视为根本性威胁。在此情况下，共和党愿意为特朗普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开脱——无论这种行为多么不民主——只要这有助于党派胜利。这种逻辑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并助其挺过了两次弹劾。

民调网站 538：美国民众对于枪支暴力的担忧剧增

美国民调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6 月 9 日登载其数据分析员杰弗里·斯凯利（Geoffrey Skelley）等人的文章称，通过对比 5 月和 6 月的两次民调结果发现，美国民众对枪支暴力的关切骤增，且关注程度存在党派和族裔差异。文章摘要如下：

近年来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但通常是少数事件在引发媒体的大量报道后，才能刺激公众舆论转向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法规。根据 6 月针对美国民众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乌瓦尔德市（Uvalde）枪击案发生后，42%的人将“犯罪或枪支暴力”列为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较 5 月的数据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

从民调数据来看，美国人对“犯罪或枪支暴力”的关注度存在党派和族裔差异。绝大多数民主党人（58%）将枪支暴力列为最关心的问题，虽然共和党人对该问题的关注也有所上升，但变化幅度较小，仅由 5 月的 19%上升到 29%。从种族角度来看，黑人（由 35%增至 55%）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由 23%增至 61%）将“犯罪或枪支暴力”列为国家最重大问题之一的人数比例大幅上升，高于白人群体（由 19%增至 35%）。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民主党人关注程度较高的原因，因为民主党人在种族上更多元。

除了枪支暴力问题外，“通货膨胀”、“政治极端主义与政治极化”等问题也得到美国人的重点关注。就“通货膨胀”而言，与 5 月数据相比，有更多的受访者将其纳入关切，且其中共和党人的增幅相对显著，由 65%上升为 75%，独立选民的关注度也有所上升，民主党人则相对稳定。“政治极端主义与政治极化问题”也始终未跌出美国公众最关注问题的前三名。此外，美国民众对“堕胎问题”的关注也有所上升，但并非其最关心的问题。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 辑 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　　编：200020
电　　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